

我對邢慕寰院士的一些感言

黃春興（清華大學經濟系） 2000/10/30

這學期，我在系上開了一門全新的課，叫「知識、創新與經濟」。爲了準備這門新的課，我幾乎耗盡所有的時間。本來認爲這下子完了，不知要如何才能騰出時間來準備今天的研討會。說也巧合，上星期我竟然得了感冒，喉嚨失聲，只好停課一週。更奇妙地，喉嚨雖失聲，但不怎麼痛，大腦也還清醒。我猛然地發現，竟有三、四天的時間空了出來，讓我準備一下。

我從未見過邢院士，即使最接近的一次，也是間接的，那是發生在蔣碩傑先生逝世六週年的紀念會。記得，我將蔣先生思想轉變的稿件交給吳惠林教授後，過了幾天，吳教授來電告訴我說：邢院士看過了稿子，指出一處時間上的錯誤，此外沒什麼意見。這等於是給了定心丸。說真的，雖然我們深信自己的研究，但要公開說蔣先生亦曾困惑在社會民主思想下，的確需要強而有力的背後支持。邢院士及時來的「沒什麼意見」，其實已是千言萬語了。

對邢院士的自由經濟思想，我早已仰慕。在干學平教授和我合寫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也用了一頁的篇幅討論他提議的「中央發展外匯基金」。邢院士生前抱怨經濟學界未重視他的提議，或許是因爲我們還不在他的「觀察名單」之列。

我們認爲邢院士的建議，理論上不會影響到貨幣供給。不過，這建議也不是沒有成本，如競租行爲、官商勾結等弊端一定會接連爆發，就像政府的 921 救災行動一樣。此外，這項他自稱是在「非常時期」才會提出的政策建議，我們也不認爲對自由經濟的精神會有多大的傷害。早年，蔣先生在推動外匯券時，也同樣是在「大家對台灣沒有信心」、「有人想把錢帶到美國去做寓公」的非常時期下提出來的。在奧地利學者中，海耶克的意識形態算是比較溫和，有時也會採取折衷的辦法。吳教授說邢院士深受海耶克的影響，因此，我們對於這在「非常時期」提出的政策建議，也就較能釋懷。

不過，若從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來推，我不認為海耶克會同意「中央發展外匯基金」的設立。海耶克不認為貨幣政策能夠維持中立性，因為貨幣供給都必須經過一些通道，絕無法像新古典學者那麼輕鬆地假設讓直昇機自天上灑下鈔票。除了公開拍賣的方式外，幾乎所有的貨幣供給通道都控制在既得利益者或官僚的手中。當有權有勢者搶先取得外匯後，也就等於搶先取得賺錢的商機。沒錯，經由他們的投資，景氣會好轉，但其他配合的生產因素的價格也會隨之上升。這使得商機與利潤會隨著時間而消退。無權勢者只能在較晚期取得外匯，即使這些晚來的外匯能降低一些資金成本，但商機與利潤都已消逝。這就像蔣先生反對的由威權決定的貨幣供給一樣，因為這是另一條「五鬼搬運」的管道。

在書中，我們認為只贖下將外匯存底公開拍賣的唯一方法。當然，這做法必然衝擊到中央銀行在外匯存底和貨幣發行兩方面的壟斷特權。此外，外匯存底既已公開拍賣，邢院士所擔心的「坐待台幣升值」的預期心理，也就不復存在。一但去除了「坐待台幣升值」的心理，企業家自然會去尋找有利潤的投資機會。

邢院士曾多次感嘆道：經濟學者對台灣經濟成長的經驗，說過太多的讚美和太少的批評。同樣地，我們尊敬邢院士，才以從不同角度討論他提出的「中央發展外匯基金」。

從邢院士的著作中，我學到較多的是他在台灣經濟發展方面的論述。但今天，若要表示一些這方面的見解，則很困難--因為吳教授和李、許兩教授的兩篇引言論文，把邢院士的精闢見解全都講光了。我只能撿食他們吃剩的雞肋。譬如說，邢教授在《台灣經濟策論》的那篇〈序言〉，就幾乎整篇都被吳教授引用，只留下最後一段。毫無選擇，我只能就這一段來談我的感觸。

〈序言〉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寫的：

寫到這裡，我幾乎想臨時取消這本選集的計劃。因為我的政策理念未能說服政府官員，或竟被完全忽略也是代表失敗，而失敗並不光榮。最後我之所以決定仍照原定計劃出版，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後人從 1960 年代初

期到 1990 年代初期的「台灣經濟經驗」得到一點教訓，將來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每一個人的經歷不同，感觸自然也不盡相同。對我而言，這段話道盡了邢院士一生的志業和學養。

邢院士表明他提出政策理念的目的，是要「說服政府官員」。作為社會科學的一環，經濟學的最終目的也在於改善社會。但是，在認識到個人知識的極限以及人際間存在的差異之後，經濟學者所能做的，就只有說服（或勸服）一途。當然，從政是改變社會較直接的方式，但從政必須仰賴權力的強制力，也就必然要去壓制某些人的選擇。邢院士深刻了解身為一位自由經濟學者的這個立場，無悔地選擇了說服作為一生的志業。不過，邢院士有時的顧慮似乎稍多了一些，例如不贊成學者利用媒體發表意見等。如果說服是學者改善社會的唯一方式，那麼，他應該鼓勵學者多利用媒體發表意見才是。

其次，在感覺到無法說服官員之後，邢院士「幾乎想臨時取消這本選集的計劃」。這句話不能解釋成他對無力感的陳述。無力感是專制心態的另一種投射，因為它常是個人，尤其是學者，在無法掌握改造社會的絕對權力之後出現的心態。社會是眾人長期選擇之後所呈現的表相。即使悲歎社會的不斷向下沈淪，堅守自由經濟的學者依然會堅持說服這條唯一可走的路。人就是人，難免地，企盼改造的衝動也不時會與對說服的堅持相交戰。彷彿徘徊在希臘市場的聖彼得，邢院士最後選擇了將自己獻出來。我們很高興看到他掙脫絕望轉而期待於未來的喜悅，也很欣慰他最後總算決定留下《台灣經濟策論》這本文集給我們。

吳教授在文中提到，邢院士本來還有一本日記，但最後也親自帶走了。讀到此，我聯想到 Adam Smith 臨死前的吩咐，要求他的好友務必要燒盡他的未完成稿。人的一生活一次，活時盡力，該下台時也不必悔恨或遺憾。人間世的可貴在於代代延續，每個世代也都得自行摸索。若還有值得留下來的，那應只是沈澱後的隻字片語。這已經足夠了。

〈序言〉的最後一句話是「將來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在《策論》裡，邢院

士一再地提到：台灣經濟經驗的錯誤，是未能在 1960 年代後期拋棄「新重商主義」的包袱。這點，吳教授已有極深入的分析，我就不再重複。這裡，僅簡單地引用邢院士的一段話：

相應的貨幣供給量大幅增加，也終於導致國內游資氾濫，因而掀起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瘋狂投機。這時一般對發展前途沒有信心的企業，正好轉向加入投機行列。同時，那些本來刻苦耐勞的員工也多離開原來的生產崗位，而從事一夕致富的金錢遊戲，以致許多辛苦撐持的產業反而受到不正常的勞工短缺和工資上漲的壓力；加上金融和保險等服務業（包括投資公司）復乘勢推波助浪，遂使台灣以『賭國』之名騰笑萬邦。（p. 230）

其實，蔣先生也曾道出和邢院士幾近相同的觀點：

不料央行表面同意採納，而內心仍想操縱匯率，遇工商界之御用經濟學家們叫囂匯率不可升高，否則出口工商業均將崩潰時，即刻將台幣貶值或不令升值，並且無限制地收購外匯，以致外匯如此累積，而國內收購外匯之貨幣亦如此氾濫，造成前數年股票、房地產之狂飆，使一般人都心存投機，不甘耐心從事生產，對工業的長期投資、生產力的改進，危害不淺。（《訪問紀錄》，p133）

當時，憂慮台灣社會陷入瘋狂投機的學者絕不僅邢、蔣二人，但我相信，能不隨口就把這些病狀歸咎到資本主義的學者一定甚少，而其中還能進一步指出病源乃肇因於長期信用擴張政策的學者更是鳳毛麟角。邢、蔣二人見解的一致，或許只是巧合，但也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

我們知道，信用擴張政策是總體經濟學家最偏愛在蕭條時期採行的政策工具。他們相信壓低的利率可以激勵投資。當然，他們也承認過低的利率會帶來過度的投資(over-investment)，並招致部份資本被長期閒置。不過，這些浪費被視為是拯救蕭條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更甚者，還有辯稱道：這些被閒置的資本，遲早會隨景氣復甦而被利用。

但是，對邢、蔣二人的經濟思想有重要影響的奧地利學派，就不如此樂觀。他

們認為：政策性信用擴張將造成「錯誤投資」(mal-investment)，而不是「過度投資」。信用擴張帶來繁榮及低利率，也讓投資者錯誤地估算其投資計畫之預期利潤。低利率固然有利於普遍的投資計畫，但更有利於上游中間財等回收期較長的投資計畫。新增之投資將競爭土地、勞力、能源等，造成這些一般性生產因素嚴重的短缺和價格的上漲。生產因素價格的上漲將提高消費財生產的成本。此外，薪資的提高也會增加消費財的需要，並提升其價格。該學派認為預期消費財價格上升的幅度，會超過生產因素報酬上升的幅度，從而降低消費財的交易數量。換言之，稍早投資於上游中間財的產品將開始滯銷，廠商隨之出現虧損。信用擴張政策誘導了生產上游中間財的廠商高估了市場的需要量，而讓他們犯了「把基礎打得過大」的錯誤投資。一旦信用緊縮，經濟危機便會爆發出來，如推倒骨牌般地。

在奧地利學派的推論中，壓低的利率將誤導流動資本錯誤地投資於上游中間財的生產計畫，而相隨提高的薪資也將增加消費財的需要。當時，台灣的工業集中於最終消費財之代工生產，貿易雖較開放，但國際金融卻多所管制。另外，國內並不具備生產上游中間財的現成技術，而消費財又容易自海外輸入。因此，氾濫的流動資本在無法流向上游中間財的生產計畫的限制下，便分成兩支：一支投資於非貿易性之消費財的生產，如各種休閒與聲色場所，另一支則遊走於理財工具之間。當然，政府也不願見此結果，便設法以政策誘導流動資本流向上游中間財的生產。誠如李、許兩教授所言，邢院士的確預見這種以中間財為對象的「第二次進口替代」。但是，與其說是期待，務寧說是擔憂，因為在進口替代的政策下，經濟自由化的腳步必然要被迫停止。同時，不同於消費財容易引進，中間財需要較高和較多的技術人員的配合。於是，在國際金融交易繼續管制、通貨膨脹預期繼續存在、第二次進口替代成效緩慢等因素下，遊走於理財工具的流動資本也就自然地流向土地、股票等市場了。

台灣的經濟經驗驗證了錯誤投資理論，只是非貿易性之消費財產業和土地、股票等市場取代了上游中間財產業。但同樣地，新增的投資一樣在競爭土地、勞力、能源等，也造成這些一般性生產因素的嚴重短缺和價格的上漲。這現象，邢院士的

觀察甚至較蔣先生還明確：「不正常的勞工短缺和工資上漲的壓力」。毫無疑問，邢、蔣二人對於台灣經濟之錯誤經驗的解釋，是與奧地利學說的錯誤投資不謀而合。不同的是，氾濫的流動資本並未如該學派的預期是變成固定資本，而是造成奢侈糜爛的「過度消費」(over-consumption) 和土地、股票等市場的狂飆。政策性信用擴張是註定要帶來經濟災難的，只是在台灣的經濟經驗中，先崩潰的不是生產上游中間財的產業，而是生產「刻苦耐勞」的整個文化。

(本文收於：麥朝成、吳惠林 (2000)，《邢慕寰院士的經濟理念、政策與學術貢獻》，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